

第一章 语言的系统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语言学派之一。它有许多不同于其他语言学流派（包括其他功能主义学派）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差别是它对语言系统的重视。这种重视在该流派的名称上已经得到反映。我们在这里将要深入探讨的是：这个学派所说的“系统”到底指什么，为什么要重视对系统的研究，以及语言系统这一概念与计算语言学发展的关系。

1 Firth 对系统的论述

Halliday(1983)在“系统语言学的背景”(Systemic Background)一文中曾明确指出：“系统这个概念来自 Firth。”显然，要弄清 Halliday 理论中“系统”的确切含义，首先必须弄清楚 Firth 对“系统”这个概念是如何论述的。

Firth 最先使用“系统”这一术语，但他对系统的解释前后并不一致。

Firth 最初使用系统这个术语时，给它下的定义很广，相当于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系统。他(1948a:143, in Firth 1957)说：“语言和个性被融入人体，而人体经常不断地参与各种旨在保留生活模式的活动。因此，我们必须预料到语言科学也会发现维持语言模式和系统 其中包括修改和变化 的必要性。这些系统内部是有次序、有结构、有功能的。这些系统依靠人类活动来维持并在活动过程中得到研究。正是基于这些理由，语言学必须是讲系统的(must be systemic)。”

但后来不久，他 1950:187, in Firth 1957 又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把那些反复出现的事件特征从一般正在发生的活动之中区分出来，这些特征看起来好像是某个具有一定模式的过程的组成部分。然后通过各种语言学的方法加以表述，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处理。”这就意味着，Firth 在这里把系统视为一种井井有条的研究方法。

时隔一年之后，Firth 对系统这个概念作出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清楚得多的描述。他 (1951b:227, in Firth 1957) 明确指出：“……人们认为，‘语言形式’在语法和词汇层次上是有‘意义’的，这些‘意义’的确定取决于语法系统中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由四个格、两个格或十四个格组成的格系统中，主格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此外他还以“数”为例说明系统的含义。他认为，有些语言中只有单数和复数两个数，而有些语言中却有单数、双数和复数三种数，另一些语言则有单数、双数、小复数和大复数四种数（如斐济语），在这些数目不等的系统中，复数这一概念的语法意义是各不相同的。

Firth 所说的系统相当于 Saussure 所说的价值 (value)。不同的是，Firth 主张给价值互定 (mutual determination of values) 的标准增加“有尽性” (exhaustiveness) 和“有限性” (finiteness) 这两条。他 (1957c:150, in Firth 1968) 说：“由语言学家建立起来的单位 (units) 系统或项目 (terms) 系统提供了一组一组的内部关系，正是通过这些内部关系使系统的价值互相确定。为了达到有效性，这些系统必须是有尽的，封闭的。”

在如何看待语言系统这个问题上，Firth 也和 Saussure 不同。他认为语言是“多系统的” (polysystemic)，而不是如 Saussure 所说的由“单系统” (monosystem) 组成的“超级结构” (superstructure)。换句话说，在 Firth 看来，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由语音系统等许多子系统构成的符号系统。外来词、感叹词和象声词这样的词，可能含有其他词所没有的语音或语音组合。非重读音节与重读音节的韵律特征也经常不同。在有些非洲语言中，名

词有音调 (tone) 系统, 而动词却没有。在泰国语中, 位于句末的小品词在音高 (pitch) 方面与其他词都不同。最早使 Firth 本人对“单系统”假说感到怀疑和不满的, 便是泰米尔语中存在的这类现象。他认为, 音系学理论应该能使语言学家们突出此类特殊的语音模式, 而不是迫使他们掩盖这些模式。

2 Halliday 对系统的论述

2.1 对 Firth 系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语言学界, 支持 Firth 多系统思想的人为数很少。其中态度最坚定、贡献最突出的是 Firth 的学生 Halliday。

Halliday 最初是在 1956 年的一篇题为“现代汉语的语法范畴”(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 的文章中使用系统这个术语的。在这篇文章中, 他把系统与单位、结构和类型(class) 视为四个主要的语法范畴。后来, 他在 1961 年的一篇题为“语法理论中的范畴”(Categories in Theories of Grammar) 的文章中, 又把系统看作是可以在结构中的特定位置上出现的一组项目。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 他把系统研究提到最重要的位置。在对系统这个概念深入探讨的基础上, 他对语言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他(1966)认为, 某个特定单位的结构成分之间的次序(order) 关系不同于横组合表层体现形式之间的序列关系。前者比后者抽象, 层次上更深。这就是说, 序列关系仅仅是结构关系的体现形式之一。

Halliday 不仅把深层语法这一概念应用于横组合关系的结构分析, 而且把它应用于语言的纵聚合关系研究, 用系统网络描写纵聚合模式的形成。在他看来, 正如结构能体现深层的横组合关系一样, 系统能体现深层的纵聚合关系。

在 Halliday 等人看来, 语言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符号系统(semiotic system)。他所说的符号系

统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组记号 (a system of signs) 而应当被看作是一套系统化的意义源泉 (resource for meaning)。在 1999 年 8 月复旦大学外文系主办的第六届全国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上, Halliday 在主题发言中明确指出, 应该把 "semiotic" 译成 "意义" 而不是 "符号" 强调的就是这层意思。客观而全面地描写语言系统的构成和运作, 研究人们如何通过 "使用语言" (languageing) 交换意义, 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Halliday 在这里之所以用 languageing 而不用 language, 是因为他强调的是语言交际的动态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发生和进展所受到的种种制约。

2.2 语言系统的特点

根据 Halliday 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家 (Halliday 1978; Berry 1972) 的观察, 语言由许多子系统构成, 但子系统之间有许多相似的特点。

一, 每个子系统都是一组可供选择的项目 (a set of options)。这就是说, 每个子系统至少含有两个选项 (item)。如英语中的 "性" 系统包含阳性和阴性两个选项, 俄语中的 "性" 系统则包括阳性、阴性和中性三个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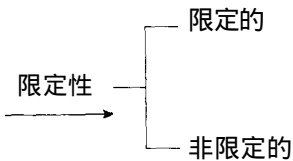
二, 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的边界 (boundary) 这个边界不可以无限扩张。边界的确定完全取决于语言事实。语言事实是可以变化的, 因而在不同发展历史时期内系统的边界有可能是不同的。我们不妨以汉语中的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为例。1919 年 "五四" 运动以前, 这个子系统只有 "他" 和 "它" 这两个选项, 而后来由于刘半农创造了 "她" 这个专指女性的代词形式, 才将选项数目由原来的两个增加到三个。

三, 同一个子系统内的任何一个选项, 对其他所有选项都具有排他性。这就是说, 选择了这个项目, 就不能同时选择其他项目。例如, 英语的语态系统是由主动和被动两个选项构成的。在选择时, 要么选主动语态, 要么选被动语态, 两者不能同时选用。有些系统所含的选项超过两个, 甚至更多, 因而在选择时就显得

复杂一些。例如，英语的时态系统含有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三个选项。如果选过去时，就不能同时选现在时或将来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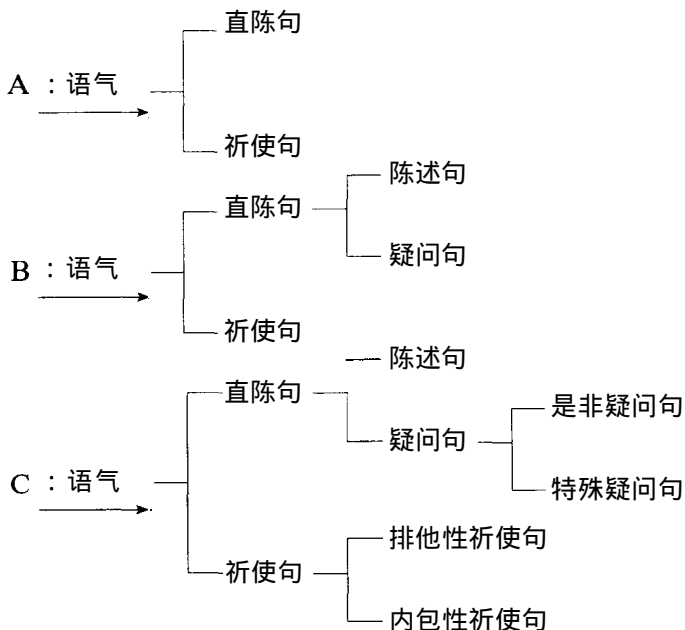
四，在语言的每一个子系统中，任何一个选项都表达一定的意义。所以，对任何一个选项的选择都是对意义的选择。人们无论是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交际，都必须不断地对语言系统作出选择。这种选择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意义的过程。选中的项目形成一定的横组合结构。结构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体现与被体现即前者体现后者的关系。

五，能归入同一系统的所有选项在意义上同属某一个语义场。单数和复数之所以能作为一对概念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同属“数”这一语义场。与此类似的有同属“语气系统”的直陈 (indicative) 和祈使 (imperative)，同属“及物性系统”的物质过程 (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 (relational process)，言语过程 (verbal process)，行为过程 (behavioral process) 和存在过程 (existential process)。针对这种现象，Halliday 等人提出了语言系统的入列条件 (entry condition) 这个问题，并对他们所描写的每个系统都附加了这类条件的说明。例如，对限定 (finite) 与非限定 (non-finite) 的选择必须以“限定性” (finiteness) 的选择为先决条件：



六，任何选项的意义取决于同一系统中其他选项的意义。如果一个选项在意义上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势必影响同一系统中其他选项的意义。如果属于同一系统的选项在数目上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也势必导致变化后所存选项意义的变化。例如，古英语有单数、双数和复数之分，其中复数意味着“多于二”而现代英语只区分单数和复数，复数则意味着“多于一”。

七，系统的划分在精密度 (delicacy) 上是有差别的，可以粗略一些，也可以精细一些。下面对英语语气系统网络 (network) 所作的三种不同的描写，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在这三种描写中，A 的精密度最低，C 的精密度最高，B 的精密度介于两者之间：



八，对任何系统内选项的选择，都是从系统网络的最左面开始，然后逐步向右进行的。以语气系统为例。第一步是在直陈句和祈使句之间进行选择。如果选择的是直陈句，第二步则在陈述句和疑问句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如果选择的是陈述句，就到此为止。如果选择的是疑问句，则需在是非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两者之间作进一步的选择。

九，人们选择系统的过程不是任意的。它起码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讲话者所要表达的概念意义的制约、语言系统本身的制约，以及语境的制约。第一点讲的是讲话者要表达的思想内

容；第二点讲的是讲话者必须遵循的语言系统所允许的表达形式和习惯，第三点讲的是语言活动参与者相互关系、交际目的和交际方式以及文化背景等多种语境因素。

2.3 Halliday 等人在系统网络描写方面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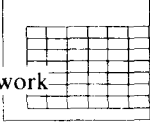
Halliday 等人对英语系统网络作了大量的研究。据我们所知，Halliday 本人就绘制了数百个系统网络。有些网络（如“时态系统”）比较简单，有些网络（如“情态系统”）则相当复杂。以 Halliday 为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如此详细而周密地对语言的系统网络进行描写，在语言学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Halliday 等人除了对英语的子系统进行描写外，还对语言的认知模型、语义模型、实体化（instantiation）、层次化（stratification）、语言的元功能成分、实体化/层次化矩阵及解释（instantiation/stratification matrix, with glosses）。这里仅以实体化/层次化矩阵及解释为例（见下页图表）。

这对于人们加深对英语深层结构的认识，对整个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尤其是语言系统的描写和运作方式研究，在理论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开拓作用。

Halliday 等人对语言系统的重视与研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语言教学、作品翻译和文学欣赏来说则更加具有指导意义。Halliday 本人对英国作家 W. Golding 在小说《继承者》（*The Inheritors*）中如何通过及物过程与不及物过程的使用反映小说人物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所作的分析，可看作是把系统理论应用于文学赏析的一个范例。国内外许多学者受到 Halliday 等人的影响，在文体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尝试，得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加拿大的 Cummings 和 Simmons 在《文学中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一书中，从语音、语符、语法、词汇和语境等多种层次入手，探讨文学作品中语言选择与意义表达之间的关系，可视为 Halliday 的系统理论具有可应用性的一个有力证明。从本世纪 70 年代末兴起的批评语言学 critical lin-

guistics 将 Halliday 等人的系统思想广泛应用于新闻语言的分析，也可资证。

实体化/层次化距阵及解释 Halliday, forthcoming):

	INSTANTIATION system	sub-system/ instance type	instance
STRATIFICATION context	“the culture” as sociosemiotic system: networks of social semiotic features constituting the system-&processes of the culture; defined as potential clusters of values of field, tenor, mode	networks of regions of social semiotic space a set of like situations forming a situation type	instantial values of field, tenor & mode; particular social semiotic situation events, with their organization
semantics	“the semiotic system”: networks of ideational, interpersonal and textual meanings; their construction as texts, subtexts, parasemes, sequences, figures & elements	networks of topological regions of semantic space a set of like texts (meanings) forming a text type	semantic selection expressions (features from passes through semantic networks),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as meanings particular texts, with their organization
lexicogrammar rank network	“the grammatical system”: metafunction 	networks of typological regions of lexicogrammatical space a set of like texts (wordings) forming a text type	lexicogrammatical selection expressions (features from passes through grammatical networks), and their manifestation as wordings particular texts, spoken or written, with their organization

有关 Halliday 的系统思想与计算语言学的联系，我们将在本

章第三部分专门论述。

2.4 语言系统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Halliday 等人历来认为，语言系统是整个社会文化意义系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除了语言系统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意义系统存在。最简单的便是交通灯构成的特殊颜色表意系统。在有些地方，这个系统由“红”和“绿”两种颜色的灯构成，前者表示“禁止通行”，后者表示“可以通行”。在另外一些地方，这个系统则是由“红”、“黄”、“绿”三种颜色的灯构成的，分别表示“禁止通行”、“准备通行或准备停止”和“可以通行”。而在上海的许多交通繁忙的地段，这个系统更为复杂，由六盏灯构成，除了上述三种功能外，又增加了“可以左拐”和“禁止左拐”等指示功能。再以足球比赛为例，每个队共有 11 名队员上场。但当其中某个队员因严重犯规而被红牌罚出场外后，场上某个队员的任务就会因此而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会引起其他一些变化。但无论如何，场上队员都会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诸如此类的非语言意义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一起构成了整个意义系统。

Halliday 等人认为，语言系统是人类用来表达意义交流思想的主要手段，但它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发展并发挥作用。用 Halliday (1983) 自己的话来说：“意义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因为如此，Halliday 等人始终把研究语言意义的产生、传达和理解与研究语言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Halliday 等人还认为，可以用层次的概念来解释语言系统运作所处的情景，即 Malinowski 所说的文化语境，这样语义层便成了介于词汇语法和情景之间的一个界面（interface）。我们在上文中引用的实体化/层次化矩阵图可以说明 Halliday 等人的观点。

2.5 系统与结构的关系

Halliday 等人高度重视语义系统的描写和运作模式的研究。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对语言结构的探讨。相反，他们在强调研究系统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结构尤其是语篇结构的研究。

就系统与结构的关系而言，Halliday 等人基本上持这样的观点：系统是供讲话者选择的意义源泉，结构是经过选择并根据语法规则组合的结果。选择过程不仅受到语言系统本身的制约，而且受到已经选出的结果即上文的限定。

2.6 系统与语篇的关系

众所周知，Saussure 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并认为语言学应该是“语言”的理论。Halliday 等人却主张语言学研究应兼顾两个方面。他们接受 Hjelmslev 将语言和言语两者并容的观点。Halliday(1983)在讲到系统和语篇之间关系时明确指出：“对一个语言学家来说，只描写语言而不考虑语篇是得不出结果的；只描写语篇而不结合语言则是不实际的。”

当我们接触语篇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分析讲话者作出了哪些选择，放弃了哪些可能性，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结果，分析语篇内部各个部分具有何种功能，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有哪些意义上的联系，通篇在修辞上有哪些特点等。

语篇是语言系统得以体现的实体，或者说是实例(instance)。在讲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时，Halliday(1992)恰到好处地把它比作气候与天气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气候是某个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一年或一个季节)的气象条件的总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而天气则是某个地区相当短的时间内的气象状况，是全年或全季节气候的具体表现。气候是长期的，天气是短暂的；气候是抽象的，天气是具体的。离开天气，就无所谓气候；离开气候，也无所谓天气。它们是整体与个别的关系。与此十分相似的是，语言系统是一个总体的概念，而在特定语境中对语言的的实际使用则是使用语言系统表达意义的实例。实例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具体与一般的关系。

Halliday 在题为“Computing mean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rospects”的文章中再次讲到了系统与实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实例,实际是一个连续体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建立起来的语言移动模型。我们所说的“系统”就是从远处观察到的语言,也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常说的“意义潜能”。而我们所说的“实例”就是从近处观察到的语言,也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具体语篇。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而不是两种现象。在讲到这个观点时, Halliday 提到了语域,认为它是介于系统与实例之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从实例一端看,语域颇像一组相似的语篇或者说是语篇类型。从系统一端看,语域则是整个语言系统的子系统。有了语域这样一个中间概念,语言学家就能建立一个语境变体的模型。

我们从上面两段话中可以看出,既可以从宏观与微观这两个角度来看待系统和实例的相互关系,又可以从观察的距离远近来分析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连续体的提出,是 Halliday 本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至于实例与体现(realization)之间的差别, Halliday(1992)则认为,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发生在语言的同一层面上,而后者则出现在不同的层面上。

3 系统思想与计算语言学

Halliday 的系统思想始终与计算语言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Halliday 就作为英国剑桥大学语言研究室的一名中文助教开始接触这门学科。当时计算语言学的任务是机器翻译。由于工作调动, Halliday 不久便离开了这个项目组。但他始终关注着计算语言学的发展,并力图在这个领域应用自己的语言理论。60 年代, Halliday 在美国执教,有机会与层次语法的创始人 Lamb 共事,共同探讨将各自的语言理论应用于计算语言学的可能性。80 年代, Halliday 又来到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学

院与 Mann 合作研究名为 PENMAN 的研究项目 探索语篇的生成。并担任这个项目的顾问,主要的语言学专家则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后起之秀 Matthiessen。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这个项目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不言而喻到了 90 年代, Halliday 与日本的菅野教授以及他的同事们相识 在人工智能研究尤其是“模糊”系统研究方面进行对话。直至今日, Halliday 对计算语言学的兴趣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越来越浓厚。因为在他看来 能否将语言理论直接应用于人工智能 是检验语言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完善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使语言理论发挥更大作用的大好机会。

在“计算意义:有关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展望的若干思考”(Computing mean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rospects)这篇文章中, Halliday 对全世界的计算语言学走过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指出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和不足,同时也对计算语言学未来的走向作了预测。

Halliday 认为,计算语言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 60 年代中期为止。其主要任务是从事机器翻译。说得明白一点,实际上就是认真考虑如何通过计算机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用一种代码取代另一种代码 用 Halliday 的话来说 就是“在语言中运用一种与计算机内在设计相同的逻辑方法来解决”。这个阶段在词汇和形态学 morphology 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分析工作 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没有真正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一种需要根据自身系统的特点进行理论探讨的现象”。可以说 在这个阶段 语言和计算之间没有产生任何直接的联系。正如 Halliday 所说“还没有做到用意义计算”。

第二阶段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到 1980 年前后为止。由于机器翻译发展到 1965 年以失败而告终,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第二阶段,语言开始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现象,语言学取代了逻辑学,成为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阶段,语言变成了问题

的焦点，变成了可以计算的对象。具体的研究任务包括句法分析、数据的抽象化、人机对话等，不再直接与翻译挂钩。人们为计算机编写了一些描写性的语法，主要是为了确定词串（strings of words）的含义。由于受 Chomsky 的影响，那时的流行观点是语法可以简化为定义恰当的结构形式，句法也就成了研究的重点。这个阶段的计算语言学虽然谈不上语篇的生成，但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开始使用网络计算语言的系统，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朝“计算意义”迈进了一步。

第三阶段从 1980 年开始到 1995 年为止。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有可能通过网络建立一些复杂程度接近自然语言的系统，通过计算来描写自然语言的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家的直接贡献是写成了奈杰尔语法（Nigel Grammar）和公共语法（Communal Grammar）。这两种语法分别由 Matthiessen 和 Fawcett 完成，时间分别是 1992 年和 1993 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人们真正开始用意义进行计算，或者说对语言意义进行计算。在这个阶段，计算与语言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以 Chomsky 为代表的主流语言学派以及其他学派的语言学家这时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语义研究上。“计算语言学”逐渐向“计算意义”靠拢，但还谈不上已经融为一体。以语篇为单位的机器翻译以“自然语言处理”的名义得到了人们的注意。

第四阶段始于 1995 年，这时候，语言已成为计算处理的核心。所谓计算，已成为“语言意义的计算”。用日本计算语言学家菅野的话来说，就是“智能计算”。换言之，就是使计算机像人那样自然地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进行交际。主要任务是从事人工智能的计算与开发。要使计算语言学朝着类似人类智能的方向迈进，就必须使计算机的运作更加接近于人类使用的自然语言，而不是经过理想化的、简单化的语言模式。Halliday 敏锐地指出，任何一个人要进入智能阶段，首先必须克服两种分离现象：一是意义表达与认知之间的分离，二是实例与系统之间的分离。换言之，一是语言与精神的分离，二是语言与言语的分离。Halliday 主张将这两种外部

的分离变为语言内部的分离：语言和认知的界限成为语法和语义之间的层次界限，语言与言语的界限成为语义系统与意义的实例之间的区别。

意义计算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Halliday 认为 要建立完整的语言复杂性管理系统，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 (1) 词通过进入词句（即词汇语法模式）而发挥作用；
- (2) 词句的意义构成语言模式或各种意义；
- (3) 意义与语境特征取得系统性的关联；
- (4) 特定的词句或意义实例根据它们在系统（系统网络内部的关系或同属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获得量值；
- (5) 系统包含子系统变体（即语域变体）；
- (6) 意义以元功能的形式组织而成（分为各个语义空间区域，这些区域决定语法的形式及其与语境之间的关系）；
- (7) 意义的历史涉及三个方面：系统的进化，单个语篇的展开以及婴儿到成人的发育（即系统生成、语篇生成和个体生成）。

虽然 Halliday 等人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意义模型，但他们已经做到对意义模型的内部结构进行详细的说明。

可以这样说，以 Halliday 为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4 Halliday 系统理论的不足

Halliday 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在系统描写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系统理论在语言教学、文体分析、人机对话等方面所具有的可应用性，是语言学界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然而，到目前为止，Halliday 等人在系统理论方面依然存在某些不足。在我们看来，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虽然 Halliday 等人对英语的子系统作了大量的描写，但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十分庞杂，很难说这种描写已经全部完成。另

外，许多子系统可大可小，取决于变数的多少以 Halliday 描写的英语动词词组系统网络为例 Halliday 考虑到的变数就有五个之多：限定性 (finiteness)，次要时态 (secondary tense) 对照 (contrast)，极性 (polarity) 和语态 (voice) 什么时候应该考虑所有这些变数，什么时候只要考虑其中的几个，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完满的回答。

二，对语言系统的描写至今未能充分反映语言的实际运作过程。即使经过努力，对语言的每个子系统都作了客观而精确的描写，也很难说这种描写对于了解语言的连续运作和运作的规律有多少帮助。我们所关心的是，语言学家能否对讲话者如何根据交际的需要而选择语言，并把每个选择的结果连成有意义的并合乎英语表达习惯的全过程作出可靠的解释。对于这个问题，Halliday(1983) 也承认：“意义系统的动态模式至今还没有很好地制订，这是语言理论家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应该承认，客观而全面地描写语言系统的动态运作模式这一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为解决这个难题，以语言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还必须下很大的功夫。

三、Halliday(1983) 认为，系统理论和语言本身极为相似，因而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在我们看来，能全面而客观地描写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并能用来生成语言的语言学理论模型，才称得上是最科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语言使用的复杂性、语境因素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们提出的语言理论显然比那些不注意此类因素的语言理论更贴近语言事实但是，迄今为止，Halliday 等人对语言系统所作的研究，离理想的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在人机对话中，尽管我们可以预先给电脑输入尽可能多的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但由于话语活动参与者、话题、讲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关系和交际目的，讲话者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方法，受话者的理解能力，讲话时的外在环境等参数随时都可能发生细微的变化，更何况由于实际使用过程中有口是心非说假话，或者故意违背常规创造性地使用语言

表达方式的可能，要让电脑和人之间的对话完全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那样灵活多变，那样得体，事实上是十分困难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机对话依靠的只是语言本身，而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除了注意依靠语言之外，还可以借助于交际双方共有的常识，对方的面部表情、手势和语调的变化，以及可能存在的第三方所作的提示，不仅听懂每句话的表面意义，而且掌握每句话的真实含义，即使对方的讲话前言不搭后语时也能揣摩一二。电脑不及人脑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当一位厨师叫学徒把一包糖放进锅里时，学徒决不会把装糖的口袋连糖一起倒进锅中，而电脑则可能犯这个错误。

据我们所知，Matthiessen 等人多年来试图应用系统功能语法发展人工智能，并在句子生成方面取得进展。我们相信，经过若干年的继续探索，他们一定能在句子层面上取得更大的成绩。但进入语篇层次后，如果还不全面考虑语境等因素，生成的语篇只能是若干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组合，而应用 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法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因此，如何将语境因素纳入语篇生成应该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

5 结束语

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语言的系统自始至终得到了 Halliday 等人的高度重视。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Halliday 等人的系统思想不是随意产生的。它是对语言学界长期重视横向结构研究、忽视纵向系统研究的一种反动。尽管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 Halliday 等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无疑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点，即使在我们对 Halliday 进行批评时也是不可视而不见的。

第二章 语言三大功能说

1 多功能论者对语言功能的看法

语言由人类创造，供人类使用，并在使用过程中得到发展。这个观点能被所有的人接受。然而，对于语言到底有哪些功能，这些功能之间有什么联系，在语言系统和结构中如何体现等一系列问题，语言学家们却见仁见智，各持己见。在本章中，我们将评述语言多功能论者对语言功能的看法，然后讲述 Halliday 的功能思想，最后谈一谈我们对 Halliday 功能思想尤其是纯理功能思想的几点见解。

认为语言具有多种功能的人为数众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德国心理学家 Buhler 美国语言学家 Jakobson，英国文学评论家 Richards，英国语言学家 Lyons 和 Halliday。

Buhler(1934 在《语言论》(*Sprachtheorie*) 一书中指出，语言有三大功能：

- (1) 描述功能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即对各种事实进行陈述的功能；
- (2) 表达功能 (expressive function) 即表现讲话者本人各种特点的功能；
- (3) 呼吁功能 (vocative function) 即对受话者施加影响的功能。

在 Buhler 看来，描述功能是语言的首要功能。

Jakobson(1960) 在一篇题为“语言学” (Linguistics)